

宋代钦州治所迁移考论*

黄粲茗

提 要: 关于宋代钦州州治徙往安远县的时间节点,一直未有确切说法。历代地方志与地理总志相互矛盾。大致有3种说法,一为北宋天圣元年(1023)徙治说,二为南渡之后徙治说,三为元代徙治说。但通过梳理官方历史文献、地方官员墓志铭以及时任郡守所留下的诗歌进行考证后得知,宋代钦州徙治安远县实际上是在嘉祐六年(1061)至治平元年(1064)之间,而徙治背后的动因并非经济发展与便利交通,而是基于城市防务的诉求。

关键词: 宋代 钦州 治所 迁移

在宋代,钦州不仅是广西军事防御体系中的关键一环^①,亦是海上丝绸之路上新兴的对外贸易港口^②,南宋时期钦廉地区的盐业利润更是广南西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③由此可见,两宋时期的钦州既是军事防御要塞,又是对外经济枢纽,对内亦是重要海盐供应地,其地理位置重要性可见一斑。

而在历史政治地理研究中,政区行政中心历来是被重点关注的。^④宋朝建立之初,钦州州治在灵山县,而最终徙至安远县,但是具体迁移时间仍存在讨论的空间。黄纯艳认为,钦州州所在天圣元年(1023)进行了变动,由灵山县南移至钦江入海口的安远县,使得钦州与交趾的海上航路更加便捷,为往后两国贸易兴盛提供了便利条件。^⑤而在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政和元年(1111)的钦州治所却仍在灵山县,直至南宋时期治所才被确定在安远县。^⑥笔者最初以为造成这种认识上的差异是因为钦州治所发生了反复迁移,即先是灵山县迁往安远县,再由安远县徙返灵山县。但是经过一番史料梳理,发现这个假设并不存在。实际上,不仅两位学者意见相左,在各种历史地理文献描述中,关于宋代钦州治所的变化也相互抵牾,以至于造成理解偏差。而探讨宋代钦州治所迁移问题,对进一步研究宋代广西军事、交通、经济关系,都具有一定意义。在此想就这个问题谈一点个人见解,以求正于方家。

一 “天圣元年”徙治与元代徙治之说

《宋史》载:“钦州,下,宁越郡,军事。开宝五年,废遵化、钦江、内亭三县。天圣元年,徙州治南宾砦。元丰户一万五百五十二。贡高良姜、翡翠毛。县二:灵山,望,有咄步砦。安

* 本文为广西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资助项目“宋代广西高层行政组织运作及其变迁研究”(项目编号:YCSW2020137)成果之一。

① 参见郑维宽:《论宋代广西地缘军事防御体系的构建》,《广西社会科学》2016年第4期。

② 参见陆韧、苏月秋:《宋代海上丝绸之路广西口岸发展与西南地区的交通贸易》,《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③ 参见钟伟民、王建军:《宋代广西地区的盐业和盐政》,《盐业史研究》1988年第2期。

④ 参见周振鹤:《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十五讲》,中华书局,2013年,第16—22页。

⑤ 参见黄纯艳:《宋朝与交趾的贸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2期。

⑥ 参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宋辽金时期》,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34页。

远，下，唐保京县，宋初改安京，景德中，改今名。有如洪、如昔二砦。”^① 从这看出，钦州州治在天圣元年徙到南宾砦。需要指出的是，在宋朝建立之初，钦州州治在钦江县，后被废入灵山县。北宋初年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载：“钦州，宁越郡，今理灵山县，原领县七，今二：灵山，保京。”^② 这点是没有疑问的，但是这个南宾砦又位于何处？《读史方輿纪要》的“灵山县”条目载：“南宾废县，县西八十里，隋置南宾县治此。唐改为灵山县，《宋志》：钦州，天圣元年，徙治南宾砦，盖尚取故县为名也，治平三年又徙今治。”^③ 顾祖禹认为天圣元年的州治迁徙是发生在灵山本县辖区之间，未曾迁到安远县。但是要注意的是，在顾祖禹的说法中，灵山县自身治所还有一次变动，不为《宋史》所载，就是在治平年间（1064—1067），这个问题下文再解释，在这里先讨论天圣初年徙治问题。

从《读史方輿纪要》记载上看，顾氏认为州治迁移至安远县，应是元朝时期：“灵山县，汉合浦县地，隋开皇十八年置南宾县，属钦州。唐初因之，贞观十年改为灵山县，仍属钦州。宋徙州治此。元徙州治安远。”^④ 而明代钦州知州林希元在编纂《钦州志》时，曾对宋元时期钦州治所迁移做出考证：

宋太祖皇帝开宝四年，置广南西路，钦之版籍始归有司，属广西路。五年，废钦江、内亭、遵化三县，以其地并入灵山县。景德三年，改保京县曰安远。天圣元年，自灵山徙州治安远。按《一统志》：“天圣初，自钦江徙州治灵山，元徙州治安远。”“元”疑其讹。今考国朝《清类天文分野》：“梁武帝于钦江县置安州，唐贞观十年，自钦江徙治灵山。”则徙治灵山乃在唐时，其徙治安远在宋时，《一统志》误也。^⑤

从这里可看出，林希元认为钦州州治在天圣初年发生了移动，并且是迁到安远县，而不是南宾砦，还顺带纠正了《大明一统志》的错误。而顾氏所言钦州徙治安远县在元代，林氏与顾氏二人观点相左。因此还需要从南宋的地理丛书寻找答案。祝穆《方輿胜览》载：“梁武帝于今钦江县南置安州。隋改曰钦州，取钦江以为名，改钦州为宁越郡。唐复为钦州，又置玉州、南亭州，并隶钦州总管府，改为宁越郡，复为钦州。国朝因之，初治钦江，后治灵山。今领县二，治安远。”^⑥ 在此先阐明一些问题，引文所言的“初治钦江，后治灵山”，实际上还是在灵山县辖区内的变动，因为在开宝五年（972），钦江县是被并入了灵山县。可以看到在祝穆的记载中，钦州州治已经变成安远县，也就是说，在南宋士人的认知中，宋代徙治安远县一事是很清晰的。

南宋史料基本上已经否定顾氏元代徙治安远县之说，而林氏的宋代徙治安远县之说是可信的，那是否意味着林氏的天圣元年徙治安远县的说法可信呢？《钦州志》这样记载：“州城旧在灵山县思林都，今旧州圩其故址也。地卑气郁，人多死于瘴疠。宋天圣元年，推官徐的始建议迁

① 《宋史》卷90《地理六》，中华书局，1977年，第2244页。

② 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67《岭南道十一》，中华书局，2007年，第3200页。

③ 顾祖禹著，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輿纪要》卷140《廉州府》，中华书局，2005年，第4762页。

④ 顾祖禹著，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輿纪要》卷140《廉州府》，第4761页。

⑤ 林希元著，陈秀南点校：嘉靖《钦州志》卷1《沿革》，“天一阁明代方志选刊”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灵山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1990年，第7页。

⑥ 祝穆著，施和金点校：《方輿胜览》卷42《钦州》，中华书局，2003年，第756页。

近海白沙之东，即今旧治。”^①此外，书中还引用万人俊一段记载：“旧郡水土不利，朝野具闻。稼穡岁望而不登，岚霭昼昏而罔霁……昨，本路转运使司封员外郎郑天益提辖之暇，经度海隅之地，抗疏封章，上闻宸聪，朝廷念兹远俗，申明劝农使度支员外郎许式、副使成正忠、国子博士江泽从而审察，咸曰：便宜。于是经之营之，国兆元亨之吉，远者近者咸为垦辟之劳。屏强徒如苇蒲，救生民于涂炭，阴阳之利既博，封守之固永宁。而复命有闻，允诏斯下桂林监护，上阁未侃漕输。郑天监暨郡守符侍禁、朱正用，佐幕僚徐的共宣厥谋，俾集其事。”^②在这段引文的描述中，天圣元年徙治安远之事似乎班班可考。那么这里又出现了一个问题，《钦州志》与《宋史》在同样时间、地点上对徙治的地点出现了矛盾，《宋史·地理志》中已言：“天圣元年，徙治南宾砦。”而上述引文作者万人俊，为元代钦州教授。^③这也意味着他在撰写该文时已经距离宋代徙治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因此还需重新审视这段历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对天圣元年钦州徙治之事有详细记载，现引用如下：“钦州深在山谷间，土烦郁，人多死瘴毒，推官建安徐的献策于转运使，请徙濒水，转运使以闻，且留的再任办役。辛酉，诏从其请。的短衣持梃，与役夫均食，筑城郭，立候楼，为战守备，画地居军民，治府舍、仓库、沟渠、廛肆，皆得所安。”^④

可以看出，天圣元年的钦州徙治是存在的，但是并非明确徙治地点为安远县。此外，徙治程序也有所不同，应先是由钦州推官徐的上书于转运使，经过转运使覆议后同意。而万氏在作《记》时却把转运使作为徙治的谋划者，徐的只是作为配合工作的官吏，这显然是不符合逻辑的，转运使长期坐衙于桂州，又何以懂得钦州的恶劣条件？虽然转运使也会出巡所部州县，但是只有在特殊情况之时，例如检阅边卒等。况且在《记》之中未载转运使本人亲临钦州，而是上书朝廷派遣了一众较高级别的中央官员进行考察，这显得更加吊诡，虽然治所的移动不是小事，但是也不至于这样兴师动众，万氏或是为了突出钦州城市文化之重要性而加以夸张描写。

此处显然是《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记载符合历史事实。但《长编》并未明确提及迁往安远县。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州治确实在天圣元年发生了变动，但是存在两种不同说法，一是迁徙治南宾砦，二是迁徙治安远县。这两者在地理位置上存在本质区别。上文已言，南宾砦属于灵山县辖区之内，不与海洋相接，而安远县位于入海口，已经属于海滨地带。而在引文中，并未对徙治具体位置进行详细描述，只能从看出徙治地点为“濒水”之地，而并非“濒海”之地。该地可以确定是在钦江附近，但是钦江几乎贯穿整个钦州行政区域，灵山、安远皆临其水，因此不能作为推论州治位置的依据。《宋会要辑稿》则明确记载天圣元年徙治于南宾砦，并具体到某月某日。“天圣元年四月二十八日，广南西路转运司言，相度钦州徙南宾砦建置，委得安便。从之。”^⑤而上文所见，顾氏虽然错误地认为元代才徙治于安远，但是他在对天圣元年徙治安宾砦也是清楚地记载。因此，笔者比较倾向天圣元年徙治安宾砦的说法，而不是徙治安远县，真正徙治安远县另有其时。

二 南宋时期徙治之说

上文已对顾氏与林氏关于元代徙治安远县的观点进行了讨论，证实元代徙治说不可信，而宋

① 林希元著，陈秀南点校：嘉靖《钦州志》卷6《城池》，第218页。

② 林希元著，陈秀南点校：嘉靖《钦州志》卷6《城池》，第218—219页。

③ 林希元著，陈秀南点校：嘉靖《钦州志》卷4《职官》，第126页。

④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0《天圣元年四月丁巳》，中华书局，1922年点校本，第2322页。

⑤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189册《方域七》，中华书局，1957年，第7435页。

代徙治安远县之说是可靠的，但是在宋代具体徙治的时间，还需要进一步探究。前文已经引用南宋地理书《方輿胜览》对元代徙治进行否认，那再看北宋地理书又是如何记载钦州建置沿革的。《元丰九域志》载：“钦州，宁越郡，军事。治灵山县。”^①《元丰九域志》成书于元丰三年（1080），可见北宋中期钦州治所仍在灵山县。

《輿地广记》又载：“（钦州）今县二，望，灵山县，本汉合浦县地，隋开皇十八年置南宾县，唐贞观十年更名，后自钦江徙州治此，皇朝开宝五年省钦江，遵化，内亭三县入焉。下，安远县，本安京，旧置安京郡，隋平陈郡，废属钦州，唐至德二载，改曰保京，后复曰安京，皇朝景德三年，改曰安远，有安京山、如洪水。”^②《輿地广记》成书于徽宗政和年间，由此可见北宋后期关于钦州治所还是被记载于灵山县。那是否可以说明北宋钦州治所仍在灵山，而徙州治安远县在南宋呢？施和金曾对徙治南宋之说作出考补，认为是《宋史·地理志》失载。^③而随着笔者进一步梳理史料，发现钦州州治可能于北宋中期已经进行变动，但是不载于各地理书之中。

宋人沈辽在《东上阁门使康州刺史陶公传》时有这样一段描述：“上已知（陶）弼能矣，因欲属南方事，即擢拜崇仪副使、知容州。明年迁六宅副使、知钦州。州旧治宁越，徙新城未久，上下悉草舍，弼始教人坯陶为瓦屋。未期，堂堂多大厦，至今视他州为雄。”^④作者沈辽（1032—1085）活跃于北宋中期，所言比较贴近历史现实，故其言有可取之处。这段引文，可以捕捉到一些蛛丝马迹。“（钦）州旧治宁越。徙新城未久”，这句话无疑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宁越”本指唐代宁越郡，治钦江，但是钦江在北宋初期已被废入灵山县，这里又言“徙治新城”，笔者认为这指的就是安远县。在北宋中期，钦州只辖二县，即灵山县和安远县。按照逻辑而言，若说旧治宁越，那么陶弼上任所在地必定是新治。对此，下文会做考证。陶弼在治平元年到治平二年（1064—1065）之间曾经担任知钦州，他的事迹无疑最具有说服力。《钦州志》有载其事迹：“庆历中，杨畋讨湖南徭，弼上谒，畋授之兵使往大破之，以功得阳朔主簿。侂智高犯南海，畋为安抚使，辟参军府，罢，调阳朔令，课民植木官道傍，夹数百里，自是行者无夏秋暑暍之苦。他郡县悉效之。摄兴安令，移书说杜守尚固^⑤浚灵渠以通漕，不听。至李师中，率浚之。师征安南，馈饷于是乎出，大为民利。知宾、容州，徙钦州，重葺郡城，浚治壕堑，郡治愈固。能为诗，政暇多题咏，备在郡《志》。”^⑥在林氏描写中，陶弼“重葺郡城”，这与林氏一直坚持的天圣元年徙治说有一定关联。但实际上这段引文与《宋史·陶弼传》几乎一模一样，唯一不同的是，林希元在最后自作主张添加一段“重葺郡城，浚治壕堑，郡治愈固，能为诗，政暇多题咏，备在郡《志》”，似有欲盖弥彰之意。^⑦

而在沈氏的描写中，陶弼就任之时，郡治刚新迁不久，“上下皆草舍”，新治所本来面貌就如此，何来重葺之说？而天圣徙治说已经被证实有误，当取沈氏之说。此外，陶弼在任知州之时，留下许多诗歌，对于考证钦州州治建设有重要参考价值。例如《三山亭·其一》：“诸峰不

① 王存著，王文楚、魏嵩山点校：《元丰九域志》卷9《广南路》，中华书局，1984年，第435页。

② 欧阳忞著，李勇先、王小红校注：《輿地广记》卷37《钦州》，四川大学出版社，第1182页。

③ 参见施和金：《〈宋史〉地理志补校考》，《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

④ 沈辽：《云巢编》卷8《东上阁门使康州刺史陶公传》，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79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230页。

⑤ 笔者按：此处有误，应该为桂守萧固。

⑥ 林希元著，陈秀南点校：嘉靖《钦州志》卷8《名宦》，第270—271页。

⑦ 参见《宋史》卷334《陶弼传》，第10735页。

及此三峰，翠影多年路未通。野老传来无地主，神仙留待与山翁。珣弓射灭虎狼迹，长剑剪开荆棘丛。吏引旌旗先险阻，匠营楼阁出虚空。……火炬影沉山岸北，潮声流过郡城东。”^①“三山亭，在州治南三山岭上。”^②这里需要注意，这里的州治是指明代州治，也就是宋代安远县。而从陶弼诗歌中可以看出，当时安远县自然环境还是比较原始的，可从“路未通”“无地主”“虎狼迹”“荆棘丛”一系列词语中看出。身为知州的陶弼见证了钦州徙治安远县后的周边建设，此时的陶弼已经常驻安远县，从“潮声流过郡城东”可见，在钦州下辖二县中，只有安远县近海，灵山县则处于内陆。如《望安南海口》一诗载：“喜逢晴日破阴霾，望极西南瘴海涯。夷狄古今常反复，朝廷终始务绥怀。”^③这里又可以看出，陶弼所处的环境是可以看到海洋的，如果他坐衙于灵山县境内，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再如陶弼在酒后入睡前感慨写的一首《吟石》：“守边无一事，江上得闲吟。醉吃歌微出，狂书墨不深。潮痕没高岸，月色透疏林。此意无人解，宵分泪满襟。”^④又可见陶弼居住环境充满着各种海洋元素，距离海岸已经非常接近，而钦州除安远县能提供这个条件之外，别无他处。《五湖亭》一诗，更是能间接反映出其位于安远县进行处理政务：“七堤环绕四城隅，限隔烟波作五湖。书吏写供都水帐，画工描入职方图。东流满郭湖相似，寒气侵人瘴自无。日际诸蛮尽冠带，将军何计学朱陶。”^⑤林希元注：“五湖亭，在州城外一里。”^⑥

这些诗歌从侧面可以反映钦州州治确实在治平元年之时已在安远县，因此，南宋徙治说恐怕有误。此外，治平年间灵山县还曾发生一次变动。上文已言，从天圣元年钦州徙治南宾砦后，南宾砦一直为钦州州治、灵山县治所在地。但是州治在治平元年前不久已经徙往安远县。但是灵山县的县治是还在南宾砦，而治平二年陶弼又将灵山县治徙往别处，结束了南宾砦承担县级区域行政中心的地位。《钦州志》曰：“治平二年春，诏徙钦州灵山县治于石六山下，以便民。夏五月，余得朝命还湖湘。”^⑦此亦可对天圣徙治南宾砦之说进行相互佐证。

三 嘉祐年间钦州徙治及其原因

在沈氏为陶弼作传记中曾言的“徙新城未久”，又可得出一个信息，即在治平元年之前不久钦州州治才徙往安远县，但是出于什么目的呢？为何钦州治所在这个时间节点上进行徙治呢？在这个问题上，沈氏也没有能说清楚，庆幸的是，《户部员外郎直昭文馆知桂州吴公墓志铭》解答了这个疑惑，并把当时广西的地方形势大致勾勒出来：

嘉祐六年三月，五峒蛮寇钦州，边兵屡战没。乃进公户部员外郎、直昭文馆、知桂州，经略广西事。公至，则搜其利害，无所遗落，疮痍之士，皆起以奋。始筑州城，凿甘棠水以注壕，缭边之地，障塞完固。蛮人纳土请吏，特磨、安南皆来献。逾明年，得暴疾以卒，年

① 林希元著，陈秀南点校：嘉靖《钦州志》卷7《亭榭》，第248页。

② 林希元著，陈秀南点校：嘉靖《钦州志》卷7《亭榭》，第248页。

③ 林希元著，陈秀南点校：嘉靖《钦州志》卷9《拾遗志》，第309页。

④ 林希元著，陈秀南点校：嘉靖《钦州志》卷1《山川》，第20页。

⑤ 林希元著，陈秀南点校：嘉靖《钦州志》卷7《亭榭》，第249页。

⑥ 林希元著，陈秀南点校：嘉靖《钦州志》卷7《亭榭》，第249页。

⑦ 林希元著，陈秀南点校：嘉靖《钦州志》卷1《山川》，第26页。

四十九，嘉祐壬寅九月某日也。^①

该墓志铭作者为宋人郑獬，亦活跃于北宋中期，接近历史事实现场，所言具有一定真实性，而文中的吴公则是广西经略安抚使、知桂州吴及。如将该墓志铭与沈氏为陶弼所作的传记联系在一起，宋代钦州治所迁移的历史过程已经非常清晰。可见，钦州州治迁移至安远县筑城应该于嘉祐六年（1061）开始，而陶弼上任之初，州治已经徙至安远县，但是城市的基础配套设施还未建设完成，与沈氏所言的“徙新城未久，上下悉草舍”存在合理逻辑关系，而陶弼也正好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因此，宋代钦州徙治安远县应于嘉祐六年至治平元年之间，具体时间则已无考。

从吴及的墓志铭看，北宋嘉祐年间钦州一带的蛮人威胁着该区域的安全，促使吴及在广南西路开展一系列筑城运动，钦州徙治与该时代背景密切相关。由此也可以看出钦州徙治安远县原因在于自身区域的防务问题，而非出于与交趾经济贸易的意图。而钦州在此次徙治之后，州治一直维持于安远县内的近海地区，直至今日。虽然熙宁年间交趾北侵曾攻占钦州，但是钦州城市基础设施未受太大破坏。宋神宗在邕州守官苏缄殉国后曾这样对其子说：“邕州若非卿父守御，如钦、廉二州贼至而城破，乘胜奔突，则宾、象、桂州皆不得保矣。昔唐张巡、许远以睢阳蔽捍江、淮，较之卿父，未为远过也。”^②这段话从侧面也体现出，钦州的陷落实际上由于未能积极防守。而钦州虽然暂时陷落，但是能较快恢复其城市建置。熙宁战后宋交双方划分疆界，宋朝放弃对交趾“汉唐旧疆”的收复意图，双方不再存在悬而未决的政治遗留问题，双方宗藩关系趋于稳定，边境贸易也逐渐繁荣。而钦州在徙治之后也在客观上为随后海外贸易繁荣以及开展盐政提供了一个稳定、安全的城市环境。

结 语

综上所述，在时间节点上，天圣元年徙治说、南宋徙治说、元代徙治说基本上已证实为误，这也是宋代地理书之间互相抵牾的一个结果，而明代钦州知州林希元在《钦州志》中虽然纠正元代徙治之说，但是又陷入天圣徙治说之中，后人引用时多受其扰。而北宋嘉祐六年至治平元年之间已经完成自灵山徙州治至安远的过程，此后钦州治所一直得以长期稳定在近海区域，客观上促进了钦州的行政中心从内陆至近海之间的转变，为后世王朝对钦州的滨海城市定位提供了历史依据。

（作者单位：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本文责编：程方勇

^① 郑獬：《郾溪集》卷21《户部员外郎直昭文馆知桂州吴公墓志铭》，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68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194页。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73《熙宁九年二月辛丑》，中华书局，1995年，第6684页。